

西方文论关键词

暗恐/非家幻觉

童明

内容提要: 弗洛伊德 1919 年在《暗恐》一文中阐述的“暗恐/非家幻觉”,是“压抑的复现”的另一种表述,亦即有些突如其来的惊恐经验可追溯到心理历程史上的某个源头;熟悉的与不熟悉的并列、非家与家相关联的二律背反,构成心理分析意义上的暗恐。本文从心理分析的首要意义以及“重复的冲动”和无意识的关系说起,分析暗恐的种种特征,如负面情绪的重复、非家和家的并存、复影作为复现的形式、记忆和忘却、暗恐的再创特点、另一种时间策略等等,并阐述暗恐的概念怎样将心理分析和美学交织在一起形成现当代文学所特有的负面美学现象,以及暗恐如何深刻影响了叙述、后殖民、民族主义等等重要的当代理论课题。

关键词: 弗洛伊德 心理分析 暗恐 非家幻觉 压抑的复现 复影 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11)04-0106-11

略说

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名曰“压抑的复现”(return or recurrence of the repressed),或“重复的冲动”(repetition compulsion)。1919年,弗洛伊德在《暗恐》(“Das Unheimliche”)一文中阐述的“暗恐/非家幻觉”(The Uncanny / Unheimlich),是“压抑的复现”的另一种表述,亦即:有些突如其来的惊恐经验无以名状、突兀陌生,但无名并非无由,当下的惊恐可追溯到心理历程史上的某个源头;因此,不熟悉的其实是熟悉的,非家幻觉总有家的影子在徘徊、在暗中作用。熟悉的与不熟悉的并列、非家与家相关联的这种二律背反,就构成心理分析意义上的暗恐。在德语中,

暗恐的相应词是 unheimlich,相当于英语的 un-home-ly,直译为“非家幻觉”。但在英语里,unheimlich 的相应词却是 uncanny,中文译为“暗恐心理”或“暗恐”,音义结合,恰好与英语相通。不过,这个概念既然源自德语,德语的原意不容忽略,“非家幻觉”的译法应该与“暗恐”并用或互换。由于心理分析和现代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暗恐/非家幻觉的概念广泛用于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化研究,更为当代理论所青睐。

repetition compulsion 也被译为“强迫重复”。因心理分析术语的中文译法尚未统一,本文中术语的中文译法有些由本文作者所译,与其他译法相左之处,在文章中有简短说明。

综述

暗恐/非家幻觉的语境

对暗恐/非家幻觉的概念的理解,首先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语境:一、现代心理学的首要意义;二、“压抑的复现”或“重复的冲动”的概念。

现代心理学的首要意义是什么?弗洛伊德说,这个新学科是针对人类中心知识论(man-centered epistemology)的“第三次革命”。以人类为中心的知识论,即人类自视为“万物之本、万物之灵”,并由此将世间万事喻人化(to anthropomorphosize the world),以此构成知识和文化体系。这种知识论渗透西方文明,也渗透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中国文化里“天人合一”的语义复杂,有些语境下与人类中心相悖(如老子),而有些语境里人类中心知识论的影子却隐约其间。

人类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此种知识论的缺陷逐渐有所觉悟。人类自以为是的思维,曾表现为认定地球是平的,一直往前走即抵达深渊的边沿,而这种真理后来被航海的经验推翻,此为第一次革命。后来,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看法成为真理,在西方受到宗教神权的佑护,却被以哥白尼为代表的革命所颠覆,此为第二次革命。启蒙运动以来,以笛卡尔为象征的主体论,推崇一个先验自足、稳固不变的主体,亦即“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我思和存在等同,同样是过份相信人的思维能力,也是自以为是的真理。现代心理学挑战笛卡尔主体论,即为“第三次革命”。弗洛伊德之后的心理分析领军人物拉康,将弗洛伊德的世界(the Freudian universe)和哥白尼的世界(the Copernican universe)相

提并论,正是此意。哥白尼的世界挑战的是西方宗教裁判所代表的地球中心论;弗洛伊德的世界挑战的是笛卡尔代表的先验自足的主体论。因此,心理学的首要意义是哲学思辨层次上的意义,亦即针对笛卡尔式主体论再次进行启蒙。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告诉我们,我们的“自我”(所谓“主体”)不是一个先验的、固定的思想实体,而是在各种力量——比如语言结构、社会象征秩序、历史发展、各种压抑——支配之下不断变化的;“我”之中存在着他者、陌生的因素。心理分析鼓励我们有勇气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之中包含着“异域”或“异质”(foreignness);我们对自己而言也是陌生人(We are strangers to ourselves),故而我们并非生来就是自由的。心理分析这样看待自己(主体)的思辨,其价值高于其治疗所带来的商业利益,只是现代商业社会往往将价值本末倒置。

心理分析对主体论的思辨,不仅针对个人主体,也是对国家、宗教、社会等力量的探究。在弗洛伊德的整体思维里,个人的冲突,最终指向文明的各种制度的问题。换言之,通过主体或个人的危机进入对文明和集体的思考,是弗洛伊德对文明各种问题思辨的方法和途径。

心理分析的再启蒙价值,在当代理论视野之下显得更清楚。例如德里达曾指出,解构哲学有三位直接的先驱者: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其中,弗洛伊德(以后还有拉康)的贡献是把“我思”从“在场”(在柏拉图的二元对立中,与absence相对的presence,通译为“在场”)的中心位置上请下来,揭穿了“我之在场”(self-presence)的迷思(myth)。(Derrida:916—17)

弗洛伊德提出“无意识”既是为揭穿“我之在场”的神话,也是与柏拉图理性传统相抗衡,因为笛卡尔主体论是这个传统

的延续。柏拉图传统将人的理性思维功能夸大至排斥人性的其他功能和特质(如意愿、本能、情绪、想象等),将这些人性的功能视为非理性、“不在场”乃至“愉悦的杂音”(noises of pleasure);理性传统其实是一个理性第一、理性唯一的传统(the reason-first and reason-only tradition)。弗洛伊德阐述无意识(the unconscious),偏偏要证明所谓的“不在场”是真实的存在,所谓“杂音”是不可否定的人性。无意识不仅存在,而且始终活跃,而“压抑的复现”正是“无意识”的证明。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写道:“这样,我们从压抑的理论中获得了无意识的概念。我们认为,压抑是无意识的原型。”(Freud, 1960:5)

弗洛伊德认为,“压抑”(repression)是文明社会中人格发展的一部份,因为文明必然要在各个方面控制人性。我们生活在文明社会里所形成的自我,其实是三我一体,即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之间能量的综合和平衡。成年的人格,意味着对各式各样的早期、原始欲望(例如,包含性涵义的幼年的“依恋物体”)的超越(surpassing),而超越其实是不同程度的压抑——对此类压抑的论述散见于弗洛伊德关于性的各种研究。成年的人格,也带有文明的禁忌(即超我)和本我之间冲突留下的各种压抑的痕迹——这方面的论述在《文明及其不满》里最为集中。弗洛伊德的论述决不是像许多人想象的那般温情脉脉,请听这句话:“文明控制个人反抗的欲望,方法是削弱这种欲望,使之解除武装,并且在他内心里设置一个看管他的机构,就像在沦陷的城市里驻扎一个警备部队。”(Freud, 1961:84)对“警备部队”的恐惧持续下去就成为不自觉的恐惧。持续被压抑的一定是无意识,因为持续被压抑的元素不能进入意识。不过,无意识中的压抑,在

特定条件下还是会被唤醒,以我们不知觉的方式复现,一次又一次地复现。

“压抑的复现”这一概念又可以用“重复的冲动”(也有人译为“强迫重复”)解释。一个人已经忘记或压抑的事情,应该是“不记得”了,可是我们却会在无意识间把不记得的事“演”出来(acting it out)。茫然不知地重复上演,就是“重复的冲动”。人们不自觉“演”出的,多半是心灵中的痛苦、创伤和其他负面的情绪。在《超越唯乐原则》第二章中,弗洛伊德以一个幼童的游戏为例说明这一点。这个还在牙牙学语的一岁半的男孩非常依恋妈妈,而且很乖,不哭不闹。如果妈妈几个小时不在,他会把一个玩具扔出去,嘴里念念有词:fort, da(德语:走了,在那儿),显然是感伤妈妈的不在;孩子又用一根线把玩具拖回来,再把它扔出去,继续说 fort, da,继续重复他特定的游戏。这个幼童是弗洛伊德的孙子。fort/da 成为“重复的冲动”特有的一个喻说符号。

值得强调的是:被压抑的形形色色,不仅存在于所谓有精神问题的个人,也同样存在于所谓正常的个人。人的精神现实(psychic reality)通过人的身体而存在,借由语言而展现,表现于人的各种正常或不正常的行为之中。因此,精神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医药复健和语言调整的双重方法治疗。分析师形成的职业本能,是他们对病人无意识的敏感;他们的工作是通过解读、对话,将被压抑的欲望带入意识,通过意识解消抗拒,使之逐渐得到精神的整合。心理分析的语言实践,成为心理分析和文化研究、文学实践之间便利的桥梁,也成为多学科之间对本体问题共同关心的领域。

《暗恐》的摘要

以上面两个问题作为背景和语境,不

难理解弗洛伊德 1919 年的这篇论文的价值。文章分为三部份：一、通过词源、词义的例子，为暗恐奠定心理分析学的解释。二、以霍夫曼的《沙魔》为例，阐述暗恐的表现特点及其与心理历史的关联，同时解说何为“复影”(double)。三、将现实生活中的暗恐和文学中的暗恐做比较和区分，进而说明暗恐在社会和文化中的普遍存在。

一、弗洛伊德首先指出，传统的美学忽略了负面情绪在美学中的重要，因此新的美学研究应该和心理分析结合为一体。对暗恐的研究就是这样的课题。

在通常的意义上，暗恐是一种惊恐心理，一种对不可解释、不知缘由的现象（比如某种超自然现象）产生的恐惧。弗洛伊德在保留暗恐通常语义的基础上，从心理分析学角度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暗恐是一种惊恐情绪，但又可以追溯到很久前就已相识并熟悉的事情。”(Freud, 2007:515) 这个定义已经把当下似乎不熟悉的情感（惊恐）和过去的熟悉联系起来，为下文的发展做了伏笔。

接下来，弗洛伊德着眼于许多词典中关于 unheimlich 和 heimlich 这一对德语词的若干特别语义，以文字学支持心理分析的暗恐内涵。unheimlich 的主要语义是：非家的、不熟悉的、不受控制的、令人不适的、令人惊悚的；此外它还有个不常见的用法：本来是私密、隐蔽的东西显露出来 (the revelation of what is private, concealed, hidden)。所谓隐蔽，是指对“自己”而言，是自己似知非知的秘密在不经意、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显露了。它的反义词是 heimlich，通常的语义是：家里的、熟悉的、友好的；但它的另一个语义是：隐蔽的、秘密的、看不见的、不被自己所知的。因为这后一种意思，heimlich 有时成为 unheimlich 的同义或近义词。这正是弗洛伊德的论点：unheimlich

也是 heimlich，非家的源自家里（“家”在此做宽泛的比喻）。换言之，被压抑的复现同时有“家”和“非家”的两面。由此可见，暗恐或非家幻觉毋宁说是心理分析中压抑的复现的另一种说法。

二、霍夫曼(E. T. A. Hoffman, 1776—1822)是个擅长写恐怖奇幻故事的德国小说家，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就是以他的中篇小说《胡桃夹子和鼠王》为基础改编的。弗洛伊德以霍夫曼 1817 年的小说故事《沙魔》(“The Sandman”，通常译为“睡魔”，但“沙魔”更准确，因为“沙子”在故事中有具体的涵义不可省略)注释暗恐/非家幻觉的规律，似在暗示心理分析和美学之间的紧密联系。不过，作为文学作品，《沙魔》的结构比较工整，逻辑清晰，应该和心理分析师通常面对的案例有所不同。

故事主角纳撒尼尔(Nathaniel)是一个大学生：“虽然现在很快乐，但[幼年时]他所敬爱的父亲神秘和可怕的死亡的那些记忆使他无法忘怀。”故事的逻辑按时间顺序复述比较清楚。纳撒尼尔还是孩童的时候，母亲为了让孩子们早点睡觉，吓唬他们说“沙魔要来了”；接着，纳撒尼尔就会听到一个访客沉重的脚步声，访客和父亲一谈就是一夜。所谓“沙魔”只是母亲编出来吓唬孩子的，但是保姆添油加醋的说明听起来十分逼真：“他可是个坏人，小孩子不睡觉他就来了，然后撒一把沙子在小孩眼睛里，那眼睛就冒着血从头上蹦出来。然后他就把眼睛放在袋子里，带到半月(half-moon)上去喂他的孩子。”如此等等。(Freud, 2007:518—19)虽然纳撒尼尔对保姆的故事将信将疑，但对所谓“沙魔”的恐惧已经在心里播种。一天晚上，孩子们所畏惧的访客律师科毕柳斯(Coppelius)到父亲的书房和父亲在壁炉前见面，纳撒尼尔躲起来偷听，被科毕柳斯发现。科毕柳斯

吓唬他,要把火里通红的煤渣丢进他眼睛里,父亲出来求情才得以制止。这之后,纳撒尼尔大病一场,认定科毕柳斯就是沙魔。一年后,有一次父亲和科毕柳斯在书房里,不知为何发生了爆炸,父亲死亡,科毕柳斯从此失踪。弗洛伊德特别指出:保姆说的沙魔和科毕柳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让孩子害怕失去眼睛。

纳撒尼尔上大学后和克拉拉(Clara)相爱并订婚。这时,在大学城里有个意大利籍的眼镜师叫科波拉(Coppola,名字和科毕柳斯相似),他叫卖太阳镜的样子让纳撒尼尔害怕。纳撒尼尔从他那儿买来一个袖珍望远镜,用来偷窥斯帕拉桑尼(Spalazani)教授家,发现教授有个漂亮的“女儿”奥林匹亚(Olympia),从此堕入爱河不能自拔。奥林匹亚其实是个机械人玩具,她的机械部分是斯帕拉桑尼教授做的,眼睛却是眼镜师科波拉的杰作。有一天,纳撒尼尔碰上教授和眼镜师为奥林匹亚的所属权争吵,科波拉把奥林匹亚的木质“眼睛”扯了出来,斯帕拉桑尼又把“眼睛”扔到纳撒尼尔的身上,纳撒尼尔顿时失控。过了好长时间,纳撒尼尔逐渐回复正常。有一天,他和未婚妻克拉拉登上市政厅的楼顶,用望远镜观览市容,不料看到了失踪已久的律师科毕柳斯。纳撒尼尔顿时疯狂,从楼顶坠落身亡。

这个故事里,“沙魔”代表的恐惧是无意识中的压抑。弗洛伊德说,儿童心灵深处对失去眼睛的恐惧常常是对被阉割阳具的恐惧。这种恐惧广泛反映在梦境、神话、民间故事以及心理分析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沙魔(被压抑的恐惧的象征)在纳撒尼尔生活中多次复现,却并非以原有形式复现,而是以其他的、非家的方式复现“家”的某些痕迹。具体说,沙魔现象是以“复影”(double)的方式复现的。

double的基本语义是镜中的影像,译为“复影”取再次出现的影像之意;通常译为“双重人格”有可取之处,但是在许多语境中行不通。弗洛伊德回顾了心理学家兰柯(Otto Rank)1914年对“复影”演变史的论述。兰柯指出,“复影”是人的心理需要的投射,往往和镜中的影像、阴影、保护神以及人们对灵魂的相信和对死亡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古时,“复影”反映的是古人的自爱、自恋的心理,是防止自我被毁灭的一种保证;所谓“永生的灵魂”是肉体的第一个“复影”,所谓“保护神”也是产生于同样的心理。在这个阶段,“复影”是神灵的面孔。这个阶段过后,“复影”又以魔鬼的面孔——即对死亡的恐惧的阴影——出现。因此,神灵和魔鬼同出于恐惧死亡的心理,是同一心理的不同表现。

在兰柯论述的“复影”演变史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强调了“复影”在压抑复现过程中的暗恐作用。在《沙魔》故事里,对沙魔恐惧以复影方式出现了多次。律师科毕柳斯是沙魔的复影;眼镜师科波拉也是沙魔的复影;科波拉和斯帕拉桑尼之间的争吵又是科毕柳斯和纳撒尼尔父亲(坏父亲和好父亲)的复影;而机械人奥林匹亚则是纳撒尼尔自己心理的复影,确切说是纳撒尼尔对失去眼睛或被阉割的恐惧的复影。

三,弗洛伊德进而分析了暗恐/非家幻觉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不同。在现实生活中,幼年时对一件事的恐惧,随着成长、随着对这件事的深入理解就会被克服,弗洛伊德称之为“现实的检验”(reality-testing)。然而,文学作品里面的人物以及读者(或观众)所经历的恐惧,往往不需要经过“现实的检验”,因为读者在经历文学的虚构事件时会调整自己的期待。比如,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出现在舞台上,但丁描写的地狱情形,我们都会从虚构本身

的特有逻辑去理解。用柯勒律治的话说,文学作品的读者会暂时“心甘情愿地搁置[自己的]不信”(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当然,这种情形在阅读奇幻故事、童话故事时比较常见,而阅读有现实效果的故事时比较少。弗洛伊德说:“[文学中的暗恐]与现实生活中的暗恐相比较是一个更加富饶的领域,前者囊括了后者的全部,而且包括了更多,包括了现实生活中没有的[暗恐]现象。”他据此将暗恐的现象扩大至文学乃至文化的广阔领域。与前面对“复影”演变史的论述相呼应,弗洛伊德指出:“但丁《炼狱篇》的死魂灵或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麦克白》、《凯撒大帝》固然阴暗可怖,但这些未必就比荷马的神灵的欢乐世界更加暗恐。”(Freud, 2007:530—31)

弗洛伊德对暗恐的神魔两面的见解可谓深刻。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暗恐理论直指人的不自由状态的根源。恐惧不安因素一旦出现,就会形成心理历史;恐惧不安存在于个人,也存在于文化;它不仅以阴暗可怖的形式出现,也以光鲜明亮的形式示人。对魔鬼的惧怕、对神灵的崇拜,只是暗恐的两面。走向自由,首先要承认不自由的存在,认识不自由的根源和表现。所谓心理治疗,就是克服不自由。

负面美学:

现代美学和心理分析的交织

弗洛伊德对心理分析的建构和他的文学知识密不可分,他常常以文学阅读的方法阐述心理分析的概念。从《暗恐》这篇文章的结构、方法和细节来看,弗洛伊德是以文学批评家和心理分析学家的双重身份在发言。他开宗明义,直指问题所在:传统美学历来关注美丽、漂亮、崇高,但忽略对情感的研究,更对厌恶、苦闷等负面情绪疏于论述;而美学应关注的不仅仅是美丑,还需

有情感。他的潜台词不言自明:忽略了负面情绪的传统美学是不完整的美学。

弗洛伊德重视负面情绪在美学中的地位,和现代文学的发展不谋而合。现代文学的进步意义,表现在对“光明进步”的价值体系的虚伪性的觉醒、对浪漫理论的质疑、对资本主义造成的各种异化现象的抵抗。现代文学越来越关注焦虑不安及其背后的种种真相。西方政客们满口“光荣、神圣”的词汇,让海明威这样的现代作家联想到芝加哥的屠宰场。因为漂亮光鲜的东西有时让人作呕,看重被扭曲的表面的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艺术、荒诞戏剧、小说中的“怪异”人物(the grotesque)就成为新的美学模式。简而言之,现代文学日益看重和恐惧、扭曲、焦虑、异化相关的负面情绪而形成的美学,不妨称为负面美学(negative aesthetics)。卡夫卡就是负面美学的典范。

所谓负面美学,并非以前曾被简单斥为堕落、消极、反动的资产阶级美学倾向。恰恰相反,负面美学所强烈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代表的是一种积极的反思能力。弗洛伊德以后,阿多诺的几部理论作品、尤其是他的未完成著作《美学理论》(*Aesthetische Theorie*, 1970),也提出了负面美学问题。艾斯藤森(Astradur Eysteinnsson)在《现代主义概念》中有一节专门论述“阿多诺的负面美学”,(39—44)指出现代主义采用不易交流的叙述方法,看似负面,却是资本主义逻辑话语的反面。他特别指出了阿多诺对卡夫卡的看法:“卡夫卡作为作家的力量……正是‘现实的负面感’的力量。”(42)负面美学引导我们看到不自由的原因,而追求的是自由。从历史哲学考量,负面美学旨在走向康德所希望的启蒙理想,即人类要走出被别人所监管的不成熟阶段,才能真正自主。

弗洛伊德在《暗恐》中提请我们注意负面情绪的美学价值,把心理分析这个现代学科和现代美学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作为负面美学一部分的暗恐理论,其美学特征和价值是多面的。首先,欲望、焦虑等等复杂的因素被引入传统的叙述理论。传统叙述学的鼻祖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诗学》对故事情节的逻辑和营造讲得十分详细,其中提到好的情节必须曲折复杂,而且应该出人意外,然而《诗学》恰恰略而不谈构成复杂和意外情节的心理因素。弗洛伊德使我们看到,叙述的稳定和和谐之外的不稳定性是欲望和焦虑,此种不稳定(叙述的暗恐性)更有美学的魅力。这样,如文学批评家林登博格(Robin Lyndenberg)所说,弗洛伊德使我们同时注意到“叙述的稳定结构和不稳定的文学性之间的交融,因此,惯例和创新、法则和非法、逻辑和谰语、意识效果和无意识效果成为[叙述]混合体”。(1072)林登博格还认为,暗恐性的叙述突出了叙述者为了表达内心的冲突从而和语言局限性展开的不断搏斗,造成了现实和想象界限的美学模糊。我们可以这样归纳:“欲望”进入叙述理论,凸显了文学虚构的具体涵义;而认识到“我”内心中的“非我”(或异域、异化)因素的存在,使人性的探索更动态、更立体。

暗恐的几个特征

暗恐的特征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非家和家并存 暗恐的主要特征,是非家和家的并存、不熟悉和熟悉的并存。unheimlich 也是 heimlich:这是暗恐的基本定义。从时间上说,暗恐也将现在和过去连接为一体。

记忆还是忘却 那么,作为压抑复现的暗恐,是记忆还是忘却?准确的回答是:在忘记状态下的“记忆”。所谓压抑,正是

要忘却过去,因此,对被压抑的事情的“记忆”只能是不自觉的。自己似乎忘却的“秘密”在不经意的情形下显现,亦即暗恐式的泄露。你以为忘记了被压抑的情绪之时,它以偷偷摸摸的、无意识的、不被你马上辨认出来的方式复现。所以,称压抑为“复现”而不是“回忆”是有道理的。然而归根结底,暗恐还是可以归入“回忆”的一种——它是忘却式的回忆。法国作家杜拉斯的电影剧本《广岛之恋》依据暗恐构成情节,恰如其分地把忘却和记忆的并存作为主题映衬出来。

压抑的复现也是一种再创造 暗恐式的复现,不是压抑的全部,而是被压抑的某些痕迹(traces)的再现。复现的形式和过去的情形不同,却又相关联。比如在《沙魔》故事里,眼镜师科波拉和斯帕拉桑尼教授本来和纳撒尼尔的过去无关,但是由于“眼睛”这个母题的联系,他们之间的争吵就成了律师科毕柳斯和纳撒尼尔父亲之间会面的复现。再举几个现实的例子:有一个女子,家人在二战“屠犹”中丧生,但不知为什么,每一次看到希特勒的照片就会泪流满面。有一个中国的孩子在文革中目睹父亲在红墙前面被人殴打,多少年之后,在巴黎某个画展的一副鲜红的油画前突然昏倒。此外,有些人对某种意识形态甚至某种音乐都会激动失控,也是一种暗恐现象。暗恐是一种大多数人都有的一种“病症”。用美学的术语表达就是:压抑好比是无意识中的一个不受控制的作家,“他”重复地用旧的素材撰写新的惊恐故事。这个“作家”在重复写作的时候,“我”真的是“我”,“你”真的是“你”吗?我们无意识间将过去和现在混同的那个片刻,在心理分析学里称为“转移”(transference)现象。我们对现在的某个人、某件事、某种情景做出暗恐反应时,那个陌生的人、事、情景就是复影。掌握了

心理分析的原则,我们在复影这面镜子里或许能看到自己过去的某种“家事”。

负面情绪的特征 过去的压抑,以焦虑不安等负面情绪为复现的方式。塞托(Michel de Certeau)说得好:这种过去会“再咬[你]一口”(it “re-bites”;il re-mord),而且是“秘密地、重复地咬”。(3)为了对付“过去”,“现在”采取遗忘策略;而“过去”呢,善用记忆的残余反攻。反攻的残余份子似乎是些外星人、异域分子、陌生人,其实“他们”并不陌生,你见过的。你在排斥这些“外人”的时候,排斥的却是自己内心的某些“异域”。此外,“过去”咬你的时候,还会以一种“他者法则”(law of the other)控制你,凌驾于你之上。比如,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就把他儿子管得透不过气来。(Certeau:3—5)

另一种时间策略 叙述的暗恐或暗恐的叙述,也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塞托指出,弗洛伊德对个人历史的分析和集体历史的分析(分别以《梦的分析》和《图腾和禁忌》为代表),是他心理分析的两根支柱;他的分析方法,最终为的是揭示文明社会的制度和机构的问题本源。为说明弗洛伊德的这种用意,塞托提出,历史学和心理学可以理解为两种时间的策略(two strategies of time)。历史学的方法,以现在和过去分成两块截然不同的空间为基础。换言之,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历史学的叙述以此获得所谓客观性。然而,心理分析的方法,通过个人的负面情绪把过去和现在连在一起,牢不可分。(Certeau:5—8)这种个人的、私密的经验,指向历史和文化的危机和冲突,因而具有历史价值、是另一种历史方法。在弗洛伊德看来,个人的病症,本源往往在于文明和个人的冲突所造成的压抑。补充一句,暗恐代表的历史方法或时间策略在文学叙述中更是常见。

现当代文学和当代理论中的暗恐

确实,暗恐已成为文学叙述原理和文学评论的概念。暗恐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积极作用,在于它能从人物的负面经历中提炼出历史反思和文化批评的价值。先举几个美国现代作家为例。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笔下的所谓怪异人物,其扭曲的行为,透过暗恐的规律可追溯到美国社会关于宗教、性别、性关系、职业的看法对个人造成的伤害,也可追溯到历史变迁中个人错位造成的焦虑。福克纳更是运用暗恐的高手,“复影”和“重复”成为他小说风格的标志。《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康普森在哈佛大学自杀的心理描写,虽是他北方的“非家”行为,透露的却是旧南方“家”中的深刻危机。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的戏剧《欲望号街车》里,布兰奇在新奥尔良妹妹家的种种“非家”焦虑,“演出”的是她在南方种植园家里的种种阴影。这些文学案例足以说明:将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的原则引入文学评论是必然的。

暗恐这个负面美学概念的积极价值,又见于它在族裔文学、飞散文学、后殖民文学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后殖民的世界上,殖民历史、冷战历史的种种创痛回忆挥之不去,更像幽灵似的随着移民、飞散群体旅行。居住在美国的克什米尔飞散诗人阿里(Agha Shahid Ali)在一首诗中说,那些被压抑的历史记忆像“一卷巨大的胶卷负片,黑白两色,尚未冲洗”。(1)借阿里的比喻来表述,族裔文学、飞散文学、后殖民文学、后殖民批评等,通过冲洗这些记忆的负片,将被西方主流文化长期忽略的种种历史(或“时间”)纳入了当代文化生产的视野之内。

在美国族裔文学,看似只是个人故事

的暗恐式叙述,揭露的是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黑暗、是被忽略的那些历史。非裔作家鲍德温 (James Baldwin) 的许多短篇小说,如《去见那个人》、《走出荒野》等,用暗恐复影的方式揭示了种族主义暴力对黑人和白人的伤害,入木三分,荡气回肠。另一位非裔作家莫里森 (Toni Morrison) 的《爱女》将美国奴隶制的暗恐再现为鬼魂,交织爱恨,震撼心灵。韩裔美国作家李昌来 (Chang-rae Lee) 的小说《本土语言使用者》,用层层复影将美国历史上被排斥为“外人”的亚裔的历史和心理予以重现。至于纳博科夫、纳什提、库切等等的飞散作家,则是用负片、复影的方式,把这个地球上的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的政治地缘历史一一述说出来。

在后殖民的话语中,暗恐汹涌之处,饱含家园、他者、另一时空、被压迫的历史的暗示和启迪,引发了诸多新概念的诞生。巴巴 (Homi Bhabha) 善用后殖民理论解说多元历史、多元文化的演示怎样形成当代的文化生产。在这个语境下,巴巴认为,暗恐式叙述是产生新的空间和时间形式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谈到政治和文化飞散群体的经历时,他做了弗洛伊德式的描述:“‘非家幻觉’的片刻像你的影子似地偷偷袭来。”巴巴说,在这种情况下,所谓“非家幻觉”是“家和世界位置对调时的陌生感”,或者说是“在跨越地域、跨越文化开始时期的一种状态”。(1337)他还对“家”(home)一词认真地游戏了一番,说离家者(un-homed)正是因为有“非家幻觉”(the unhomely)的伴随,所以并非无家可归(homeless)。

无论是第三世界的作家还是西方国家的作家,用暗恐叙述解读新旧殖民历史的论述屡见不鲜。例如,杰勒德和雅各布斯 (K. D. Gelder and J. M. Jacobs) 这两位

学者,针对1992年澳大利亚高级法院将马博的土地归属权判给原住民的历史性判决,认为这其中的后殖民逻辑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暗恐解释。他们指出,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原住民对土地权利的主张是奇怪的,而忽略那里的土地本来就不是欧洲人的,这正是一种“不熟悉和熟悉并存”的暗恐心理在后殖民时代的反映。

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研究是当代理论的另一个焦点。启蒙运动使世界世俗化之后,宗教群体的概念日渐淡化,国家概念日益强化,民族情绪也随之高涨。国家/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是反殖反帝的先锋,也可以是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帮凶。其狭隘的一面,表现为排外、恐外、仇外、族裔偏见和种族歧视,并且在国家/民族的疆界之内把这种种偏见转化为激情。这种情形表现在前殖民宗主国对不同移民群体(亦即族裔)的歧视和排斥上,也表现在大国兴起时产生的排外情绪和民族沙文主义方面。而全球化时代的趋势,是要克服这种狭隘,包容文化、信仰、历史的各种差异,才能逐渐实现跨民族主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新思维。

这方面最有建树的理论著作之一是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的《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这是一本以弗洛伊德暗恐理论探究各种排外思想、尤其是现代民族主义排外倾向内在原因的专著。书名《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Etranger à nous-mêmes; Strangers To Ourselves*) 是对心理分析的一个比喻式的概括,亦即我们的种种压抑、种种被文化环境所引入的“他者”因素,使得我们内心有许多“异域”尚待发掘和认识。我们对于“自己”其实是陌生的。

心理分析的这一灼见究竟是怎样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的? 克里斯蒂娃首先概括了“我们”对“外人”(foreigner)的看法:“外

人'或与之相关的“异域”或“异质”(foreignness)既让“我们”好奇,又让“我们”产生排斥、厌恶甚至仇恨;“我们”对“外人”和“异域”有一种既好奇又拒绝的心理(a fascinated rejection)。西方历史从希腊至现代的种种例子(克里斯蒂娃一书的主要内容)说明,“我们”(即便是出自善意)从民族、国家、地域、宗教、种族、性别、性向、意识形态等等所谓纯一的社会观(social homogeneity)出发,常常将“非我”的个人或群体视为他人(the other)、外人或陌生人(stranger);“我们”把他人视为外部客观的同时,无意识中将自己的排外倾向视为理所当然。在现代,“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我们有了唯一的现代、可接受的、清楚的‘异域’定义:外[国]人是和我们不同属一个国家的人,是不同属一个民族的人。”(96)由此,现代世界的种种排外、恐外情绪,以及与此相关的针对移民、异族的歧视行动、话语、法律,都聚集在了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大旗之下。针对这种现象,如果没有新的启蒙教育,单靠立法等强制方式是无济于事的。克里斯蒂娃认为,心理分析提供了这样的新启蒙教育。对“外人”或“异域”的好奇兼拒绝的情绪,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心里种种暗恐的复现。个人或群体越是以为自己的文化优越和纯粹,越是受到强力的压抑和焦虑所控制而不自觉。“外人”或“异域”恰恰使“我们”成为一个问题,……外[国]人出现时,我的差异意识出现,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也是外[国]人,我们的关联方式和群体可以改善时,外[国]人就消失了”。(1)克里斯蒂娃无疑是在提倡多元的群体观,反对纯一的群体观。这种新的文化观,落实了弗洛伊德提出暗恐观念时重新思考“主体”的真正价值。

克里斯蒂娃的结语简单而深刻:“外

[国]人存在于我的内心,所以我们都是外[国]人。如果我是外[国]人,那么就没有什么外[国]人了。”(192)

结语

弗洛伊德开启的现代心理分析学,毋宁是针对人类中心的知识论、柏拉图以降的西方理性传统以及笛卡尔式主体论的一次再启蒙。用弗洛伊德的话说,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第三次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作为“重复的冲动”或“压抑的复现”再表述的“暗恐”概念则直指“我”(乃至“我”生存的文化)之中的恐惧、焦虑、不安的生成根源和历史,揭示了理性唯一传统所掩盖的不稳定的真实存在。这样看,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就不仅仅是理论,而是人类现代文明迫切需要、不可或缺的诚实。现当代的西方文学、叙述学、历史研究、后殖民话语、批判理论在重新思考“现代性”的过程中,也在追寻一种再启蒙的思辨方式,同样看重负面情绪所包含的价值。因此,在负面美学及作为这个美学标志之一的“暗恐”这一点上,心理分析和现当代文学、文论十分自然地吻合交织,这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现象。弗洛伊德并没有看到他的理论在他身后有如此多样的发展,但他对负面美学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的重视,使他成为现代历史的预言家之一。

经由弗洛伊德的阐述,暗恐现象成为特殊的话语。弗洛伊德之后,这个话语进一步延伸。就叙述理论而言,看重叙述的稳定结构的经典理论必然被“解构”(注意,“解构”绝非摧毁,至少不是辩证法里的“否定”,而是创新式的转变),不稳定的暗恐渗透了稳定结构的叙述现象,具有更强的文学性和欲望的张力。重复林登博格的话:如此观察到的叙述,是“稳定结构和不稳定的文学性之间的交融”,是“惯例和创新、法

则和非法、逻辑和谰语、意识效果和无意识效果”的混合体。因此,叙述理论更远离了浪漫美学。多次受到质疑的浪漫美学,其“有机整体说”(organic unity)再次在暗恐理论的挑战面前显得单薄无力。同样,暗恐所启迪的另一种时间策略,和传统历史学的“客观”叙述也形成鲜明对照;善用暗恐叙述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也自然被新历史主义理论所重视。由于暗恐理论的出现,后殖民话语在揭示殖民历史和话语所极力隐藏的“秘密”的努力中多了一个方便之门。借用暗恐理论,当代理论家得以说明,为什么民族主义的排外、仇外的情绪不仅仅是一种“自大”,而且更是一种对“自己”内在“异质”因素的可怕的无知。

暗恐的潜值远未穷尽,它对思考中国文化也颇有启迪。自从“述而不作”的孔夫子以仁礼之说登上高山庙堂,他的话就如钟声经久不息,中国人被圣贤君主们引导着,深信天命所归之论。然而亘古如斯的大一统之下,各类堂而皇之的话语背后,不知有多少焦虑不安的暗恐涌动。如弗洛伊德所说,对神灵的礼拜中,依然是暗恐的复影重重。因此,中国的文化反思、中国的现代化,也需要负面美学。通过这种负面美学,弗洛伊德深刻而精微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达于“诚实”的文化途径。没有诚实,无法再次启蒙。

参考文献:

1. Ali, Agha Shahid. "Postcard from Kashmir." *The Half-Inch Himalayas*. Hanover: Wesleyan UP, 1987.
2. Aristotle. "From *Poetics*."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Third edition. Ed. David H. Richter. Boston: Bedford/ St. Martin's, 2007.
3. Bhabha, Homi K. "Locations of Culture."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Second edition. Ed. David H. Richter. Boston: Bedford/ St. Martin's, 1998.

4. Certeau, Michel de. "I. Psychoanalysis and Its History." *Heterologies: Discourse on the Other*. Trans. Brian Massumi.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Vol. 17.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6.
5. Derrida, Jacques.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Trans. James Strachey.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Third edition.
6. Eysteinson, Astradur. *The Concept of Modernism*. Ithaca: Cornell UP, 1990.
7. Freud, Sigmund. "The Uncanny." Trans. James Strachey.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Third edition. Boston: Bedford/ St. Martin's, 2007.
8. —.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1961.
9. —. *The Ego and the Id*. 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1960.
10. Gelder, K. D., and J. M. Jacobs. "The Postcolonial Uncanny: On Reconciliation, (Dis)possession and Ghost Stories." *Uncanny Australia: Sacredness and Identity in a Postcolonial Nation*. Carlton: Melbourne University Publishing, 1998.
11. Kristeva, Julia. *Strangers to Ourselves*. Trans.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1.
12. Lydenberg, Robin. "Freud's Uncanny Narrative." *PMLA*. Vol. 112. 5 (October 1997): 1072-86.
13. 弗洛伊德:《超越唯乐原则》,载《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

interactions among narrative, self and body in autobiography, particularly in autopathography.

PENG Zhen On Chekhov's "The Fiancée" 84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Chekhov's short story "The Fiancé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dynamic resources", the departure points and the post-departure experience of the heroine's key action – "departure". It discusses the plotting and manipulating of the heroine's action at the earlier stage by the narration of the story in the ideology of patriarchy, analyzes the breakthrough from the male domination in the narration of the heroine's "post-departure" experience at the later stage, and thus argues that the revision of the motive of "female liberation" in the narration makes the story more significant and meaningful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ZHANG Jinfeng Otherness and Identity in Daniel Deronda 91

The Jewish elements in George Eliot's last novel Daniel Deronda have been fiercely attacked by traditional criticism, but if we view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we will find that Eliot has chosen this subject deliberately. She explores the "otherness" of Jews in the Christian society and their efforts to build their ethn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an age of transformation, thus reflecting Eliot's humanistic concern and her political sensitivity.

DING Junjun Reading Kater Murr as an Antibiologroman 98

E. T. A. Hoffmann is considered a heretical writer of the German Romantic school. His *Lebensansichten des Katers Murr nebst fragmentarischer Biographie des Kapellmeisters Johannes Kreisler in zufälligen Makulaturblättern*, a novel of dual narrative structure, reveals the unsolvable crisis that the individual encounters in the socialization process: estrang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reality, separa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world and within the subject itself. As an *Antibiologroman*, Kater Murr not only extends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in German literature, but also brings up its own reflections upon it.

TONG Ming The Uncanny 106

The uncanny or *unheimlich*, as introduced by Freud in his 1919 essay *Das Unheimliche*, is another expression of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ion" or "repetition compulsion" in that feelings of dread and fright can often be traced to a familiar origin. Thus, the coexistence of *unheimlich* and *heimlich* constitutes the semantic core of the uncanny. Proceeding from the primary significance of psychoanalysis (that it is the "Third Revolution" challenging man-centered knowledge)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petition compulsion" and the unconscious, this essay then explores a wide range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canny (e.g. the recurrence of negative emotions, the co-presence of *unheimlich* and *heimlich*,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through doubling, remembrance and forgetting, how the uncanny recreates the past and how it functions as a specific strategy of time) and furthermore, expounds how the uncanny is a manifestation of an aesthetics of negativity highly relevant to the 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how it has empowere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related to narratives, post-colonialism and nationalism.

Tao Jiajun Trauma 117

As the product of the violence of modernity and characterized by three essential features of intrusion, belatedness and compulsive repetition, trauma is the symptom of the violent essence of modern civi-